

【历下亭】

□鲁黔

那个院子很大,清朝时乃贡院旧址,至今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了,有据可考的可追溯到北宋,曾巩任知府时曾在此院办公,并一直数代延续,韩复榘、王耀武也曾把官邸设在此地,直至建国后,一九五五年,它成为省政府大院。我们这帮共产党的后代也有幸在该院度过了一段童年少年时光……

该院在我们儿时的眼里是很大的,那里有楼房,有古香古色的四合院,有小轿车车库,有篮球场,有民族风格建筑的会议室,有黄土堆成的山,还有一个旖旎无比的西花园……

我和韦三相识于西花园,虽然我与他是同级但不同班,那时大概是上二年级,韦三个子不高,长长的眼毛下扑闪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他蹲在池塘边,用竹扫帚抽出的一根竹子绑着线垂在水中。我好奇地问他:“你干嘛呢?”他曰:“钓鱼”,并用一个手指放在嘴上,示意我别言语。随之,鱼漂上下浮动,一条金黄色的鲫鱼被活蹦乱跳地拉出水面……

省府前街一号

自那以后,我便跟他学会了钓鱼,没过多久,俺俩又被选入市少年乒乓球队,既是同学又是队友,于是顺理成章的恰同学少年,这缘分就一直伴着我们的成长与风风雨生……

西花园的池塘里,清清的水底有杂草,鱼虾们游来窜去,在假山的怀抱里有古亭,有曲径,有各种羽毛的珍稀鸟儿在此处栖息。每到春天,诸多花草树木都展现和摇曳着它们的身姿,蔷薇枝儿垂在池塘的水面上,被风儿吹拂着,轻点着一圈圈涟漪……

夏日的午间,我们这帮孩子便纵入水中纳凉嬉戏,由于水深不超过两米,彼此约定决不可手脚触及水底,谁若违规,最少罚他三天不能游泳。

老三住在西花园东岸的一所院子里,其平房便有十数间之多,你想老省长的宿舍能小吗?然而在那个年代,一般干部和百姓们却没有攀比的。因为,民间的人们有谁知道大院里的小院之故事呢……

根据那个年代的小学惯例,

住得较近的同学都要在放学后集中在一起,名曰“少年之家”,即放学后找一个完成作业的地方。于是乎,老三家便成了研究“学问”的地方了。

余省长夫妇乃文化老干部,对其孩子之同学和蔼可亲,每当下班归来,总会摸摸脸蛋,抚摸头发,逐个接见我们。这一行为,直至若干年后,我仍在怀念那时的老共产党员,在那个没有电视镜头的年月里,他们的举止和品德肯定也是发自内心的良好……

在大院的第二会议室南侧,有一间省长厕所,里面有两个坐便器,用木门锁着,只有省长们才有开锁的钥匙,然而我们这帮“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却经常趁人不备,翻入木门,堂而皇之地坐在便盆上出恭,享受一下省级待遇。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百姓的厕所大都是茅坑……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骤雨般来临了,一大批大官和老干部被打倒了。省府前街一号院除了办公和造

反派外,其住户家眷们都各自东西散去……

往事如云烟,少儿时的岁月早已成为杳渺的永远,那些西花园的玩伴,那所少年之家的同学们,都早已长大了,成熟了,并已步入老年……

有缘分的,不论在山南海北,还是在海角天涯,仍然还在联系着,交往着;无缘的,咫尺天涯,却老死不相往来。人生造化,世事沧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真是天壤之别。小时候,你能瞧出来他的将来吗?

据我所知,那帮玩伴,竟然也出了省部级大员,也出了神七、神九火箭上天亲临现场的将军,当然也有许多生不逢时的下岗职工。

数月前,在百无聊赖里,约老三及“象鼻子”之类的同窗,让一个还在省府大院里任职的发小带入院内,可谓故地重游。如今的大院,在视觉里却变得太小,那昔日的篮球场呢?那有台阶的黄土山呢?那花香鸟语、清澈流淌的西花园呢?

【泉城记事】

□雪樱

前些日子,邻居给家中小孩做棉裤,想找个对色的线,小区的超市逛遍了都没有买到,母亲告诉她去经二路上的“一间楼”,那里专门卖针头线脑,十分齐全。而母亲的话也真的像一个线头,缓缓地打开了我的一段尘封记忆。

凡是老济南,都知道一间楼。一间楼不是地名,而是一家老字号商铺,它像一个神秘的世界,零零碎碎,又五彩缤纷,堆砌着各种线、带、绳,吸引着我前去探究。据史料记载,一间楼最早创办于1840年,1927年由周村迁到济南,落户在老城区的司马府街。到了1929年,一间楼租了位于经二小纬六路口的石竹斋的房子,开了分号,叫“一间楼西记”。1956年,济南工商界全面开始公私合营,一间楼搬到经二路的路南,与瑞蚨祥隔路相望。如今,一间楼改名为济南一间楼经贸有限公司。

爷爷在世时,我听他说起过,一间楼过去有个绝活,叫“段染”,店里的伙计能够把一根丝线染成四五种颜色,这种段染的丝线十分时髦,也很畅销,人们买回去绣花,不用再更换针线,便能绣出各类颜色,所以深受大家热捧。他们还从德

“一间楼”里的针头线脑

国进口颜料,回来自己配色,再为丝线染色。这让我不禁联想起影视剧《大染坊》中伙计们染布的场景,热火朝天,冒着白气,既隆重又热烈,让人心中蓦地升腾起一股特殊情愫——对手工业的敬畏,对劳动者的钦佩。

除了针头线脑,一间楼的“扎绑带”也很有名,结实耐用,还不缩水。很早的时候,人们习惯用一根布条把小腿捆扎起来,这样不仅能够保暖,走路的时候也利索。据说,扎绑带的习俗是从旧社会传下来的,因为过去人们穿的裤子大都是自己家人用针线缝制的,样式不好看不说,而且都非常宽松,这样干活儿时比较舒服。可是,肥大裤脚走起路来晃来晃去,所以要扎绑带,尤其是冬天,扎绑带还能起到防风保暖的作用,而过年过节走亲戚串门或者出席正式场合时,人们会买一根颜色好看的扎绑带,这样脸上似乎也有面子。

后来,查找资料时,我得知,很多戏曲名角的演出行头也出自济南的一间楼。当年,梅兰芳先生来济南演出的时候,身着的行头正是在一间楼制作的,而演员所用的假发、胡须、

配饰等也是一间楼的主要经营项目。现在想想,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一间楼见证着社会变革,也是老济南历史的剪影。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一间楼,我是跟着姑妈去的,进入店里,我徒生好奇,左看右瞧,环顾上下,眼睛简直应接不暇,不停地拽着姑妈问:“这里怎么这么多线啊?这个店怎么和其他百货店不一样啊?”姑妈徐徐解释说:“这里专卖针头线脑,全济南这里最齐全。”姑妈买了一些扣子,还有毛衣针。

那时候,我才上小学,姑妈工作比较清闲,她喜欢织毛衣,编织活儿在同事圈里有口皆碑,我穿的毛衣都是出自她的手,两个中午的时间便能织出一件毛衣,而且样式新颖,很时髦,都是她自己摸索和创新的。

姑妈还给我织帽子、手套、围巾,帽子既有两个兔耳朵的那种样式,也有头顶上一个大圆球的那种,戴上很暖和,还非常漂亮,冬天和同学打雪仗的时候,他们常常趁我不注意偷藏我的帽子。姑妈的钩针编织同样很出色,家里的沙发套、茶几上的杯垫等,都能织出各种款式,四邻都夸赞她心灵手巧。

姑妈用的钩针和毛衣针,

还有毛衣上的扣子,都是在一间楼买的。后来,姑妈搬家的时候,她特意把用过的毛衣针和钩针都收藏在一个盒子里,把没用到的扣子收藏在另一个盒子里,这两个盒子收纳的不是简单的家什,而是一寸一寸的岁月,一段一段的记忆啊!

父亲带我也去过一间楼,那是母亲要缝被子,家里的针线包找不到了,父亲直奔一间楼,买回来后,母亲嗔怪他说:“买个针线,非要跑那么远干什么?”父亲笑着说:“那里的针头线脑耐用,我小时候给家里买缝纫机线都是去那里,习惯了!”

一间楼,一世界。

现在,人们追求速度和效率,没有耐心再停留在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的琐碎中,更别提买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了,或者说,在人们眼中,买现成的衣服,从网上下单才是真正的时尚,自然而然,人们与一间楼的邂逅和交集也越来越少,一间楼逐渐淡出视野。但是,那些针头线脑,那些带着体温的手工活,却熠熠发光——一针一线,缝补的不仅是衣服,更多的是从指间滑落的沧桑岁月:忧伤与快乐,痛苦与幸福,还有不可言说的浓浓亲情。

【80后观澜】

□辛然

我在济南出生,在济南长大,却不会说济南话。我出生时,刚开始提倡普通话,当时我妈准确判断今后普通话是个大趋势,所以从会说话开始,我接受的就是普通话教育。进入小学时,各个学校已经要求在校内必须讲普通话,所以并没有觉得跟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后来,有次参加初中同学聚会,一群人说说笑笑,忽然我被一个好友拉住悄悄问:“你平时也说普通话吗?”我奇怪地回答:“是啊。”她又问:“你怎么不说济南话呢?”我答:“我妈没教我啊!”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口音是个严肃的事情;你至少要会一种方言,否则就像没有身份的人。

我听得懂纯正济南话时,几乎上高中了。同时,我才知道我妈说的不是地道济南话,她是跟小伙伴们学的。而她的妈妈,则是年轻时来济的外地人。我的老爸也是同样情况。今年,我得

济南移民

到了一个新身份:济南第三代移民。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它解释了我的一些感觉,比如为什么我妈经常会提到“老济南人”这个词。理论上,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在济南生活了三代了,也应该算“老济南”了。但事实上,心理上的济南人和老济南人,是另一个概念。我曾跟一个老济南人讨论过,结论是,大明湖、趵突泉周边,围绕省府的那片地区,才叫老济南;而世代生活在那片地区的人,才叫老济南人。这个概念可能有些狭隘,但也算典型。现在,我带着外地的朋友在济南玩,在我的各种比喻、解释下,他们能明白济南有两类人:我这类人和老济南人。

我对济南习俗知之甚少,地名、历史也是;我只是居住在这里,保证10里内不迷路而已。

今年除夕那天,我跟闺蜜逛街,她是老济南人,让我陪她去千佛山底下买香,晚上她老公要

去千佛山祈福。她老公也是老济南人,每年除夕晚上进千佛山,初一零时献上第一份香,求财求福。据说那天山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大概是两年前才得知千佛山有除夕半夜祈福这件事的,感到十分震惊。我想不到这么多年来身边有这么轰动的事,自己却毫不知情。闺蜜自己没有遵守这一习俗,不过,她的母亲却是祈福大队中的一员。她身体欠佳,每年大概就爬这么一次山。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想让自己在传统节日期间遵守什么规则。比如过年,除了酥锅、饺子,父母偶尔谈起他们也很少照办的老家习俗,再无其他。跟闺蜜谈着这些,打开她车的后备箱时,发现了一箱鞭炮、一箱烟花。

我说:“你怎么还买鞭炮呢?”
闺蜜:“过年了啊,傻瓜。”
我:“不是说空气污染了,注

意环保啊。”

闺蜜愣了愣,说:“烟花可以不放,但鞭炮是必须放的。”

我想,老济南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空气污染这类现实,根本阻止不了他们除夕放鞭炮的习俗。像我们移民家庭,在媒体提倡了几次环保后,很容易就决定不放了。但对老济南人来说,这不是环保的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安全的问题。同理,城市新规,“移民”家庭接受得更快些;而老济南人这种土著,又是那种不争不辩、顺其自然的秉性,在城市变革中,除了一些温润的软习俗,比如美食,不容易改变,硬性习俗改没了也就没了。真不知道,我的小孩最终会在我这里继承些什么,可能“移民”身份就是这样:在不断地扬弃、吸收中,说不清楚是失去了什么,还是创造了什么;这个城市是你的,也不是你的,熟悉又陌生。

实录

【忆海拾珠】

那些年的压岁钱

□邱蕾

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除了有新衣服穿,还因为可以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那时家里并不宽裕,亲戚们比我们还穷,压岁钱就很少。记得初一的早上,父母长辈们开始向小孩们派发压岁钱,把我们叫住,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叠钱。嘿!朝手指吐口唾沫,从一叠钱里抽出几张,都是一元甚至五毛的钞票,递过来。我们很有秩序地默默站在一边,虽然没有排着整齐的队伍,但这时也不会争先恐后你拥我挤的,而是静静地等着,内心充满了喜悦,但脸上还要尽量做到面不露色,假装淡定。叫到谁的小名,谁便上前领钱。

那时给的钱不多,也就三块五块的样子,有时可能还是两块吧。虽不多,但这笔一年一次的压岁钱就是我们一年里最大头甚至也是唯一的零花钱了。拿到钱,我们都是乐不可支的笑模样,把钱揣进口袋,开始盘算着用它买些什么。其实选择并不多,也无非是到村头的小卖部里买些零嘴,黄瓜糖也算比较有特色,做成黄瓜的样子,还是顶着朵小黄瓜花的,平常日子里,我兜里没钱,真是身无分文,看到顶花带刺的黄瓜糖时,内心都充满向往,默默地想象着这东西得有多好吃呢。这回,手里有钱了,那就满足一下自己的期望吧,和表妹买了几根黄瓜糖,搁嘴里一嚼,“咳,我以为黄瓜糖得有多好吃,原来也不过如此呀。”我这么对表妹感叹。人生,就是那么难以满足。

那些年的冬天,我们用压岁钱买这买那,不只花到村头的小卖部里,还花在几里之外热闹的集市上。有一次,我正在外面玩耍,突然被爸爸叫回家,原来是奶奶要给我压岁钱。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奶奶一向嫌弃我,我们姐弟三人她对我最差,我们去远方时,她只给姐姐哥哥买了鞋子,刚回来后,她又是只给姐姐哥哥买了棉袄,还总对我凶巴巴的。所以,奶奶要给我压岁钱,我真是感到意外,惊喜得不知所措。我受宠若惊地站在那里,奶奶见我来了,便笑着从兜里摸出一张钱递过来。哇!竟然是十元大钞!

我在想,这么一笔巨款,我得给它找个好归宿,让它更有价值。寒假就要结束了,爸爸骑车带我回去准备上学。半路上,我开始对爸爸说起这笔额外的压岁钱,说家里不宽裕,我还是把钱给补贴家用吧。爸爸很高兴地接受了。看到那被我揣了好些天的十元钱最终落到了爸爸的口袋里,我心里很开心,还有那么一点自豪,好像自己为家里做了贡献一样,别提有多美了。

压岁钱不只给我带来了美好的感受,也带来过一丝失落,那是互相攀比的结果。有一年刚开学,去公共厕所时偶然听到有一个女生在对同伴说压岁钱的事,她大声地说,她今年挣了五十多元。声音里透出炫耀骄傲。我一听,登时生出许多羡慕,五十多元,那得是多大一笔钱啊,要知道,一根桔黄雪糕才五分钱啊,一根拽糖才一毛钱啊,这得买多少雪糕和拽糖!再想想自己,收到过最多的一笔压岁钱就是奶奶给的那十元,还是仅此一次。叔叔姑姑们给的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十元。这巨大的差距立马让我生出一缕郁闷来,看来老话说得还真对,人比人气死人。

那时的压岁钱给了家长们不少压力,也直接导致一些大人干脆不给也不收压岁钱,但事情虽简单了,但也就让没有压岁钱的孩子少了一份美好回忆,人生仿佛也有了缺憾。